

# 论评点者对明清小说文本形态的影响

陈才训<sup>\*</sup>

〔摘要〕 明清时期,在同一部小说的不同版本中,某些批点文字时常被转化成情节文字,由此小说文本形态也随之演变。明清小说评点者融评、改于一体的批评特色,使他们在事实上成为小说的“第二作者”,他们通过对小说文本的增删改易而与作者一起左右着小说文本形态的生成与演变。眉批、夹批、旁批、圈点等评点形态皆依附于小说情节文字,缺乏独立的文本价值;而其他出于评点者之手的种类繁杂、名目不一的附录也有赖于小说文本而得以传播,显然这些“副文本”已成为明清小说文本形态的构成要素。

〔关键词〕 评点者;文本形态;生成与演变

明清小说文本形态受到作者、书坊主、评点者等多个因素的影响,其中,评点者在小说文本形态生成与演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学术界虽对小说评点研究用力甚深,但其重点往往局限于小说评点形态本身,至于评点者于小说文本形态的意义,则远未给予充分关注。实际上,明清小说评点者已成为小说“第二作者”,其评点文字与正文界限的模糊性,他们融评、改于一体的批评特色,出于他们之手的诸多“副文本”即各类评点形态及种类繁杂、名目不一的附录,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小说文本形态。

## 一、批注与正文界限的模糊性

在同一部小说的不同版本中,有时某些批点文字与情节文字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游移不定的,这从一个角度表明批点者对小说文本形态的影响。以《三国演义》为例,嘉靖本中的许多小字批注,有时在叶逢春本中则变为正文。如叶逢春本中《吕布败走下邳城》写刘备被吕布击败而落荒逃走,吕布来至刘备家门首,糜竺出迎,求其放过刘备家人,吕布称“‘赐汝(指糜竺)剑一口,但有登门者即斩之。’此布之好处也。吕布保看老小上车,移往徐州安置”<sup>①</sup>。这里“此布之好处也”一语是称赞吕布善待刘备妻小之举,而在嘉靖本及联辉堂本中这句话则以双行夹注的形式存在。特别是不同版本对补

<sup>\*</sup>文学博士,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50080。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小说文本形态的生成与演变研究”(11CZW042)、黑龙江省高校青年学术骨干支持计划项目(1253G045)的阶段成果。

<sup>①</sup>陈翔华主编:《西班牙藏叶逢春刊本三国志史传》,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101页。

叙、插叙等叙事形式的不同处理方式,也导致批点文字与情节文字界限模糊。如嘉靖本中《云长策马刺颜良》:“(关羽)飞奔前来,颜良正在麾盖下,见关公到来,恰欲问之,马已至近。云长手起,一刀斩颜良于马下。……公献首级于曹操面前。【原来颜良辞袁绍时,刘玄德曾暗嘱曰:‘吾有一弟,乃关云长也。身长九尺五寸,须长一尺八寸,面如重枣,丹凤眼,卧蚕眉,喜穿绿锦长袍,骑黄骠马,使青龙大刀,必在曹操处。如见他,可教急来。’因此颜良见关公来,只道是他来投奔,故不准备迎敌,被关公斩于马下】操曰:‘将军神威也!’”<sup>①</sup>【】内以“原来”为标志的补叙成分为小字夹批,详细解释为何颜良“只道是他来投奔”而“不准备迎敌”,以致关羽能出其不意地刺杀他。正因这段夹注与正文衔接得天衣无缝、自然妥帖,因此它在黄正甫本之外的其他建阳诸本中则完全变成了正文。再看联辉堂本中《曹操仓亭破袁绍》:“(袁)绍对逢纪曰:‘吾不听田元皓之言,致有此败。吾今归去,羞见此人。’逢纪数被田丰面斥,心中常恨,到此绍问,逢纪曰:‘昨闻田丰在狱中,闻主公兵败,抚掌大笑曰:不出吾之所料也!’绍怒曰:‘竖儒怎敢笑吾,吾必杀之!’逢纪又曰:‘田丰常对狱卒曰:袁本初再求吾时,吾却不用谋矣!’”<sup>②</sup>划线处文字插叙逢纪与田丰交恶之由,而在嘉靖本中这一插叙成分却以双行夹注的形式被移至上引段落最后。有论者认为,嘉靖本中的一些小字批注在叶逢春本等其他版本中是被“混入”正文的<sup>③</sup>;但我们认为,这种改变符合当时语境,与上下文也非常连贯,且都承担着不同叙事功能,而这正是明清小说文本形态变迁的必然结果。如嘉靖本中《孙仲谋合肥大战》写道:

四郡已平,令班师早回荆州。汉上九郡已得其半【江陵、汉阳、巴陵、襄阳、江夏、武陵、桂阳、零陵、长沙,此九郡皆属荆州。古之荆州即今峡州是也。后以江陵为荆州郡】时江夏、巴陵、汉阳,东吴占据。

【】内文字为小字夹注,而它在叶逢春刊本中却变为正文:

四郡已平,班师回荆州。汉上九郡已得其六。何为九郡?江陵、汉阳、巴陵、襄阳、江夏、武陵、桂阳、零陵、长沙。这九郡皆属荆州,古荆州今峡州是也。后以江陵为荆州。那时江夏、巴陵、汉阳,东吴占据。

叶逢春本有意识地以自问自答的设问形式,将批注文字变为正文,显示出小说文本形态变迁的轨迹。

这种将批点文字转化为正文的现象在《三国演义》其他版本中也时有发生。如周曰校本与夏振宇本中《孔明挥泪斩马谡》写孔明正要斩马谡的紧急时刻:

忽参军蒋琬自成都至,正见武士欲斩马谡,琬大惊,高叫:“留人!”入见孔明曰:“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谋之臣,岂不可惜乎?”【考证:昔楚成暗弱,得臣,春秋时楚令尹也,是时晋楚战于城濮,楚师败绩,晋文公有忧色,左右曰:“有喜而忧,何也?”公曰:“得臣犹在,忧未歇也。”后楚杀得臣,晋文公闻之而后喜】<sup>④</sup>

【】内文字以“考证”形式出现于周曰校本与夏振宇本中,而在黄正甫本与熊清波本中,这一“考证”则由段尾移至段中,且变为正文:

正值参军蒋琬自成都至,见武士欲斩马谡,入见孔明曰:“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得臣乃春秋楚之令尹也,先是晋楚战于城濮,楚师败绩,晋文公有忧色,左右曰:“有喜而又忧,何也?”公曰:“得臣若在,忧未歇也。”后楚杀得臣,晋文公闻之乃大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谋之士,岂不惜乎?”<sup>⑤</sup>

客观上讲,黄正甫本、熊清波本将周曰校本与夏振宇本中的这段批注变为正文,行文既不简洁也不流

①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古本小说集成》第3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11页。

②罗贯中:《三国志传》,《古本小说丛刊》第22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91页。

③参见石冬梅:《三国演义建阳繁本小字注的特点分析》,《昆明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④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古本小说集成》第4辑,第1814页。

⑤张志和整理:《三国演义》(黄正甫刊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55页。

畅,但在逻辑上讲却并非不可,此乃明清小说文本形态变迁中的常见现象。再如,在刊刻于万历间的汤宾尹刊本中,一些重要人物首次出场时,往往以“参考”或“发明”之类小字双行夹注对其家世生平等进行介绍。而在雄飞馆刊本《精镌合刻三国水浒全传》以外的其他明刊本中,这些夹注皆以正文形式存在。有时,某些批注转化为正文的过程比较曲折,如“夏侯令女”毁容拒绝再嫁的故事不见于嘉靖本,而万卷楼本中《司马懿父子秉政》以“补遗”的形式增入此事。按照常规,“补遗”应采用双行夹注的小字形式,但其字体大小却与正文完全一样。而夏振宇本干脆删除“补遗”字样,将其完全纳入正文,此后的李卓吾评本、毛评本也同样如此。这表明,万卷楼本编刊者首先通过“补遗”这种评点形式将“夏侯令女”毁容拒绝再嫁之事植入小说文本,最终夏振宇本等又将其完全变为正文,其文本形态变迁之迹虽稍为曲折,但其演进之迹甚为明了。

由批点文字转化为正文的现象在其他小说文本形态演变过程中照样存在。如《红楼梦》庚辰本第一回开头为以“此开卷第一回也”领起的近四百字的一大段文字,而在更早的甲戌本中,这一大段文字却是其“凡例”中最后一条即第五条。再者,甲戌本第二回正文前有两大段总评,而在庚辰本中这两段总评均以正文的形式出现。据此,有论者认为庚辰本第一回开篇的那一大段文字,原本为该回的总评。也就是说,《红楼梦》卷首原有“凡例”,后来被删除,而第一回却增加了删改自“凡例”的一段总评<sup>①</sup>。其后,程高本承袭了这一文本形态,并将“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改为“更于篇中间用梦幻等字”,从而将正文与总评之间的界限抹去,最终将第一回总评固化为小说正文,而这一文本形态也逐渐被人们接受。再如《于少保萃忠传》中的一些批注文字,在其删节本《于少保萃忠全传》中则变成了正文。像《于少保萃忠传》第十四回写张太后召见群臣,称赞杨溥忠诚可嘉,于此有一段按语:

谨按:当时洪熙为太子在南京监国时,永乐因汉庶人征胡有功,心中甚喜庶人。因其喜每进谗言,毁谤洪熙,有夺嫡之心。那时杨溥做学士,时苦苦泣谏永乐。永乐大怒,遂下溥于锦衣狱中,犹手不释卷。或人讥之曰:“今日身在縲绁,尚终日看书,何为也?”溥闻言,对曰:“朝闻道而夕死可也。为人当惜寸阴,岂因事废书乎?”记者敬谢之。后来,洪熙登基,即放溥出狱,遂升大学士兼文渊阁,当日太皇太后见溥,故有此言。<sup>②</sup>

在《于少保萃忠全传》中,删节者以“你道张太皇太后为何出此言”这一设问形式引出上述按语,自然而贴切地将其转化为正文,借以说明太皇太后称赞杨溥的原因。有时《于少保萃忠全传》以特定的叙述方式将原本中的批注转化为正文,有以补叙方式转化者,如其第五回结尾云:“当日公遗计收唐赛儿,傅总兵欲表叙公指示之谋,公闻知亲往傅公营坚却,故不叙公功,皆做为许知县之绩。”而在《于少保萃忠传》中这段以“当日”领起的补叙文字却是以批注的形式出现。有以预叙方式转化者,如《于少保萃忠全传》第十二回:“此子因公之德,后来读书领贡,荐授凤阳府教官。后于公被诬死,衍上疏明公冤与功,乞加建祠祭祀以报之,此子即储衍也。”这段文字在《于少保萃忠传》中也是批注文字。有论者认为,《于少保萃忠全传》将这些批注变易为正文,或为改编者有意为之<sup>③</sup>,而这正是导致小说文本形态演变的动因所在。类似情况还存在于《东西晋演义》,其明末武林刊本“正文下多附笺注,动数十百言,大抵补旧本所未载,然亦有在此本为注,旧本为正文者”<sup>④</sup>。

有时评点者直接在小说中抛头露面,将自己的评论文字编织进小说文本,从而与作者一起促成了小说文本形态的生成。如崇祯八年金阊万卷楼刊本《新编扫魅敦伦东度记》署“荥阳清溪道人著,华

①陈毓黑:《〈红楼梦〉是怎样开头的》,《文史》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93页。

②沈士伊:《于少保萃忠传》,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6页。

③苗怀明:《几部描写于谦事迹的古代通俗小说考论》,《明清小说研究》2000年第2期。

④孙楷第:《戏曲小说书录解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85页。

山九九老人述”，“述”即评述之意，也就是说九九老人是这篇小说的评点者。有时九九老人的评完全融入小说正文，如小说第二回有所谓“九九老人读记，有七言八句以赞功德”云云，这里九九老人的评论即以正文面目示人，此处评点文字已成小说文本不可分割的有机成分。

## 二、作为“第二作者”的评点者

许多明清小说评点者有着强烈的再创作意识，融评、改于一体的批评使他们在事实上成为小说的“第二作者”，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和价值观念来重塑小说文本，从而与小说家一起左右小说文本形态的生成与演变。金圣叹曾云：“《西厢记》不是姓王字实甫此一人所造，但自平心敛气读之，便是我适来自造”，“圣叹批《西厢记》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记》文字。”<sup>①</sup>这虽是就《西厢记》而言，但这种批评主体意识照样贯穿于其《水浒传》评点中，因此他才会大刀阔斧地对小说文本形态予以加工改造。《金瓶梅》评点者张竹坡亦云：“我自作我之《金瓶梅》，我何暇与人批《金瓶梅》也哉。”<sup>②</sup>道光间，哈斯宝将《红楼梦》节译成四十回的《新译红楼梦》，并对其加以评点，他在最后一回总评中称“那曹雪芹有他的心，我这曹雪芹也有我的心”；在《新译红楼梦总录》中，他再次强调“加批者是我，此书便是我的另一部《红楼梦》，未经我加批的全文本则是作者自己的《红楼梦》”<sup>③</sup>。其他评点家虽未作类似声明，但他们仍鲜明地体现了融评、改于一体的批评特色，如毛纶、毛宗岗父子有感于《三国演义》“被村学究改坏”，因此在评点中对所谓“俗本”，“悉依古本改正”<sup>④</sup>；《儒林外史》齐省堂增订本评点者通过“补正疏漏”、“删润字句”、“整理幽榜”<sup>⑤</sup>以改造小说文本形态；他如蔡元放评改冯梦龙《新列国志》而成《东周列国志》，汪象旭《西游证道书》、陈士斌《西游真诠》等《西游记》评点本，亦皆体现了评点者对小说文本形态的加工。不妨以具体作品为例，考察评点者对小说文本形态的增删改易。

金圣叹假托“古本”而“腰斩”袁无涯本《水浒传》，对其文本形态予以大力改造，故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谓金批《水浒》“深得剪裁之妙”。从宏观上看，金圣叹将一百二十回改为七十回本。从微观上看，金圣叹在对小说文本形态进行加工改造时，其文心之细令人惊叹。如袁无涯本第十回写林冲到山神庙内避寒，用一块大“石头”靠住门；接着写陆谦等人也来到山神庙，用手推门，“却被林冲靠住了”，这样就造成前后矛盾。金圣叹对此作了修改，将“却被林冲靠住了”改为“却被石头靠住了”，这样既与前文以“石头”靠门保持一致；又照应了后文林冲在庙门内听到陆谦等人阴谋后“轻轻把石头掇开”而冲出庙门枪杀仇人这一情节。再如，金圣叹对叙事视角的调整，也显示出他作为“第二作者”的主体创作意识：

晁盖便请两个和尚坐地，置酒相待。林冲谏道：“哥哥休得听信，其中莫非有诈？”和尚道：“小僧是个出家人，怎敢妄语。久闻梁山泊行仁义之道，所过之处，并不扰民，因此特来拜投，如何故来啜赚将军？况兼曾家未必赢得头领大军，何故相疑？”晁盖道：“兄弟休生疑心，误了大事。今晚我自去走一遭。”（袁无涯本第六十回）<sup>⑥</sup>

（晁盖）便请两个僧人坐了，置酒相待。独有林冲谏道：“哥哥休得听信，其中莫非有诈。”晁盖道：“他两个出家人，怎肯妄语？我梁山泊久行仁义之道，所过之处，并不扰民，他

①金圣叹：《第六才子书西厢记读法》，《金圣叹全集》（三），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9页。

②张竹坡：《竹坡闲话》，《金瓶梅》（会评会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482页。

③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25—826页。

④罗贯中著，毛宗岗评：《三国演义·凡例》，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页。

⑤《齐省堂增订儒林外史例言》，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97页。

⑥施耐庵：《水浒传全传》，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84页。



两个与我何仇，却来掇赚？况兼曾家未必赢得我们大军，何故相疑？兄弟休生疑心，误了大

事。我今晚自去走一遭。”（金评本第五十九回）<sup>①</sup>

袁无涯本写和尚为取信于晁盖而自我辩解，而金评本则将僧人的那番话改由晁盖说出，这看似细微的改动，却将晁盖急于求胜而疏于防范的心理揭示出来。金圣叹的文本改造还反映在他对宋江这一人物形象的重塑上，如袁无涯本《水浒传》第六十回写晁盖欲攻打曾头市，宋江曾两次“苦谏”，可金圣叹却将其劝谏之语完全删除，并特意批点称“俗本妄添处，古本悉无，故知古本之可宝也”。显然，这只不过是他用以掩饰自己对小说文本形态的修改，故李葆恂《旧学庵笔记》论金评本云：“所谓古本者，皆其臆改者也。”<sup>②</sup>以上事实充分显示出金圣叹在小说评改中的“第二作者”身份，而这恰是导致小说文本形态演变的根本原因。早期评点者的意见有时也会影响到金圣叹对小说文本形态的改造，如容与堂本第三十三回写宋江来至清风寨，先写花荣“拖住宋江便拜”；接着写“花荣见宋江，拜罢”；继而又写花荣请宋江在凉床上坐定，“又纳头拜了四拜”，如此描写啰嗦不堪。对于花荣繁缛的礼节，容与堂本评者虽云“礼太多了”<sup>③</sup>，但对此并未作任何修改；袁无涯本也未加删减；金评本则将第一处的“便拜”删去而改为“拖住宋江”，将第二处完全删除，只保留最后一处并改为“纳头便拜四拜”。

毛氏父子以《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为底本对小说文本形态予以大幅增删改易，故有论者慨叹“信乎笔削之能，功倍作者”<sup>④</sup>。其中，毛氏父子的正统观念对小说文本形态起着审美整合作用。由此出发，毛氏父子对于“俗本皆删而不录”者，“悉依古本存之”，增加了诸如关公秉烛达旦、孙夫人投江殉主等情节；删除了诸葛亮欲烧魏延于上方谷、诸葛瞻得邓艾书而犹豫未决之类有诬于孔明的情节；对李卓吾评本中那些“唐突昭烈、谩骂武侯”的评语，也“俱削去，而以新评校正之”；将“俗本皆阙而不载”的《荐祢衡表》《讨曹操檄》“悉以古本增入”。当然，毛氏父子对小说文本形态的加工改造绝不仅仅局限于以上几点，如他们有感于“俗本”回目“参差不对，错乱无章”，而“每回必以二语对偶为题，务取精工”；以唐宋名家之作取代“俗本”中的周静轩诗，“削去”“俗本”中钟繇、王朗颂铜雀台及蔡瑁《题馆驿屋壁》等不可能出现于汉末的成熟七律，篇首增入杨慎《临江仙》；甚至认为“俗本之乎者也等字，大半齟齬不通；又词语冗长，每多复沓处，今悉依古本改正”<sup>⑤</sup>。可见，毛氏父子事实上也成为《三国演义》的“第二作者”。

作为“第二作者”，评点者在《西游记》文本形态演变中所起的作用也十分突出。清代最早《西游记》评点本《西游证道书》由黄周星、汪象旭“同笈评”，他们以“古本”为名而对李卓吾评本予以大幅增删。例如，他们增补了李评本及世德堂本所没有的唐僧出世故事，删除了介绍唐僧的那首长诗，将增补的唐僧出世故事安排成第九回，将原第九、十、十一回合并为第十与第十一回。以“奉道弟子”自居的汪象旭还删除了李评本中诸如“戏采白牡丹”、“飞剑斩黄龙”之类不利于吕祖的大量故事传说。再如，李评本的诗词韵语七百余处，严重阻隔了情节的连贯性，《西游证道书》只保留二百余处。仅从以上数端即可看出黄周星、汪象旭对底本改造力度之大。《西游记》其他评点者对小说文本形态的演变也起着不同作用，如张书绅《新说西游记》据《西游证道书》增入唐僧出身故事，写八十一难中的遭贬、出胎、抛江、报冤，但将原第九回至第十二回重新调整为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回。陈士斌《西游真诠》对原本的删改也很明显，故郑振铎谓其“乱改、乱删的地方极多”<sup>⑥</sup>，而这正是导致《西游记》文

①陈曦钟等辑校：《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1092页。

②朱一玄：《古典小说版本资料选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6页。

③施耐庵：《容与堂本水浒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70页。

④黄淑琰：《第一才子书三国志序》，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1页。

⑤罗贯中著，毛宗岗评：《三国演义·凡例》，第1—2页。

⑥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郑振铎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246页。

本形态演变的重要原因。

《金瓶梅》崇祯本评点者对词话本的改造力度也很大,其中最具表征的是删去了词话本中大量诗词曲赋而使其变为说散本;再就是对其回目做了彻底加工,更重要的是,崇祯本评点者通过对词话本文本形态的加工改造,明显疏远了与《水浒传》的距离。词话本比较粗糙,其中存在不少疏漏,对此崇祯本评点者也予以修补。

评点者对《红楼梦》《儒林外史》之文本形态的加工也十分显著。与曹雪芹关系极为亲近的脂砚斋直接参与了《红楼梦》的创作,其“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显然已将自己视为《石头记》的“第二作者”。同治间,齐省堂增订本《儒林外史》评点者对卧闲草堂本“提纲及下场语幽榜均有改窜”<sup>①</sup>。一是按照“阙者补之,简者充之”的原则,增加了卧评本原来缺失的第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回共六回的回评,又增加了十三则评语,每回增加了一些眉批。二是改订名实不符的回目,原本存在“回名往往有事在后面目在前”的现象,如第二回叙述至周进游贡院见号板而止,但其回目却标有“暮年登上第”字样,因此齐省堂增订本对类似错位回目“代为改正”。三是对小说情节存在的诸多“罅漏”予以修补,如范进家离城有四五十里之遥,而张静斋听闻范进中举后即刻登门道喜,这似乎不合情理,于是齐省堂增订本对这些疏漏都“代为修饰一二”。四是整理“幽榜”,对其中“去取位置,未尽合宜”处“辄为更正”,或增或删或调整顺序。五是修饰字句,对原本中“冗泛字句,稍加删润,以归简括”<sup>②</sup>。从卷首序言看,齐省堂本的增订者应为惺园退士,他自称“余素喜披览,辄加批注”,“复为补辑,顿成新观”<sup>③</sup>。显然,齐省堂本评点者通过“增订”而促成了《儒林外史》文本形态的演变。

明清小说评点者对小说文本形态的加工与改造,并非仅仅局限于以上几部名著。例如,作为评点者,“野云主人”蔡元放是《水浒传》文本形态演变的推动者,其评改本题“大宋遗民雁荡山樵编辑”、“金陵憨客野云主人评定”,所谓“评定”其实还包含改定之意。蔡元放对原本情节做了很多修改,有时甚至将其不合情理处完全舍弃而重新编撰,如原本第三十四回写燕青因射雀而碰巧射中藏身于塔内的萨头陀,这太过神奇、夸张,于是蔡元放将其改为通过共涛女儿的导引、配合才将萨头陀抓获,这样的改写更符合生活情理。再如他将原本八卷四十回调整为十卷四十回,并本着“本传之回目提纲尽皆工稳妥切,令读者于回内之事一目了然”<sup>④</sup>的原则,对原本回目做了彻底修订,仅对第二、九、三十二、三十六、三十九回这五回回目未作改动。再如,袁于令是《剑啸阁批评秘本出像隋史遗文》的编创者与评点者,他在该书《序》中称自己对于旧本中“传闻之陋”及“妖艳之说”,“悉为更易”,“可削则削,宜增者大为增之”<sup>⑤</sup>。在具体评点中,他又多次提及对小说文本的修订,如其第三回总评云:“旧本有太子自扮盗魁阻劫唐公,为唐公所识。小说亦无不可。予以为如此衅隙,歇后十三年君臣何以为面目,故更之。”第五十五回总评亦云:“原本李艺石不得见,兹为补入。既入李艺,则他人又不得不补矣。”这表明袁于令对“旧本”、“原本”的加工改造并非偶见。其他如李云翔在评点《封神演义》时曾“删其荒谬,去其鄙俚”<sup>⑥</sup>;陈继儒在“评释”《东汉十二帝通俗演义》时对“其中有称谓不协及字句之讹舛者,亦悉为之改窜焉”<sup>⑦</sup>,都体现了评点者作为“第二作者”在小说文本形态生成与演变中所起的作用。

①《金和跋后天目山樵识语》,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37页。

②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32页。

③惺园退士:《齐省堂增订儒林外史序》,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第131页。

④黄霖:《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27页。

⑤袁于令:《剑啸阁批评秘本出像隋史遗文·序》,《古本小说集成》第3辑,第14页。

⑥李云翔:《封神演义序》,《封神演义》,《古本小说集成》第4辑,第15页。

⑦陈继儒:《东汉十二帝通俗演义序》,石昌渝《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篇),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9页。

### 三、评点者与小说“副文本”

相对于正文,“围绕在作品文本周围的元素:标题、副标题、序、跋、题词、插图、图画、封面”则属于“副文本”<sup>①</sup>。就明清小说评点本而言,除上述要素外,像读法、回评、眉批、夹批、圈点、凡例、各种形式的附录也属于“副文本”范畴,其中有不少出于评点者之手。需要强调的是,像眉批、夹批、回评、圈点等评点形态皆寄生于小说正文,离开其所依附的情节文字便失去存在价值;而其他以附录形式出现的各类“副文本”也有赖于小说正文而得以传播,显然出于评点者之手的这些“副文本”已成为小说文本形态的构成要素。

其实,明清小说读者对出于评点者之手的这些“副文本”予以充分肯定,已将其视为小说文本形态的有机成分。例如,昭槁《啸亭续录》卷二“小说”条云:“自金圣叹好批小说,以为其文法毕具,逼肖龙门,故世之续编者,汗牛充栋,牛鬼蛇神,至士大夫家几上,无不陈《水浒传》《金瓶梅》以为把玩。”文人士大夫“把玩”的应是金评本《水浒传》和张竹坡评本《金瓶梅》,因为这里所谓“续编者”指的是受金评本《水浒传》影响而涌现的大量评点本。这两部广受读者欢迎的评点本除眉批、夹批、回评等评点形态外,皆附有其他各具特色的“副文本”,像金评本《水浒传》卷首附有金圣叹《第五才子书序一》《第五才子书序二》《第五才子书序三》《宋史纲》《宋史目》《读第五才子书法》及伪托施耐庵的《水浒传序》;张评本《金瓶梅》中“副文本”更为繁复,像《第一奇书凡例》《第一奇书目》《杂录》(含“杂录小引”、“西门庆家人名数”、“西门庆家人媳妇”、“西门庆淫过妇女”、“潘金莲淫过人目”、“藏春芙蓉镜”、“西门庆房屋”)《竹坡闲话》《冷热金针》《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金瓶梅寓意说》《苦孝说》《第一奇书非淫书论》《第一奇书金瓶梅趣谈》皆出于张竹坡之手,正因这些“副文本”才使张评本《金瓶梅》大受读者青睐,以致金陵文人“远近购求”<sup>②</sup>。金评本《水浒传》、张评本《金瓶梅》分别是这两部小说的定本,其中的“副文本”已成为各自重要的文本形态;而这两部小说的其他著名刊本也因多为评点本而不乏出于评点者之手的“副文本”,如《水浒传》之容与堂本、袁无涯本、双峰堂本,《金瓶梅》之崇祯本,等等。特意署为“圣叹外书”的毛评本《三国演义》为该书定本,其卷首附以毛宗岗《凡例》十条及《读三国志法》,它们与依附于正文的眉批、夹批、回评等一起成为小说文本的重要表现形态,故晚清觚庵认为“《三国演义》一书,其能普及于社会者,不仅文字之力,余谓得力于毛氏之批评”<sup>③</sup>,无疑,“普及于社会”为读者所接受的乃是附有诸多“副文本”的毛评本而非罗贯中原本。此外,《三国演义》为数众多的其他重要刊本如周曰校本、吴观明本、双峰堂本、宝翰楼本、钟伯敬评本、夏振宇本、郑以桢本、熊佛贵本、朱鼎臣本、芥子园本等也以评点本行世;其他版本如嘉靖壬午本、叶逢春本、联辉堂本等虽无系统评点,但它们却非“白头本”,正文中也夹有多少不等的评注文字。在《西游记》诸版本中,世德堂本仅有寥寥几条夹批,李卓吾评本、闽斋堂本已是系统评点本;而清代几乎所有版本像汪象旭、黄周星《西游证道书》、张书绅《新说西游记》、陈士斌《西游真诠》、刘一明《西游原旨》、张含章《通易西游正旨》、含晶子《西游记评注》等,皆为附有众多评点者“副文本”的评点本。例如,“奉道弟子”汪象旭在其《西游证道书》卷首便附有《丘长春君传》、《玄奘取经事迹》、《仙诗绣像》,书尾又附以《吕纯阳祖师全传后卷》。再以《红楼梦》为例,甲戌本、庚辰本、己卯本等抄本都附有多少不等的脂砚斋评语,而脂砚斋在甲戌本第一回批中所谓“一芹一脂”之说,既已表明脂批已成为小说文本不可分割的一

① 弗兰克·埃斯拉夫:《杂闻与文学》,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1页。

② 朱一玄:《金瓶梅研究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6页。

③ 觚庵:《觚庵漫笔》,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437页。



部分。《红楼梦》一些刻本也多为评点本,以致道光间铭东屏致信张新之称“《红楼梦》批点,向来不下数十家”<sup>①</sup>,其中双清仙馆刊本《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影响最大,该批本中“副文本”出于评点者王希廉之手者包括《批序》《红楼梦总评》《红楼梦图说》《红楼梦摘误》《音释》,以及由王希廉副室周绮所撰《红楼梦题词》十首。这些名目各异的“副文本”乃王希廉批本不可或缺的文本表现形态,并被读者欣然接受,故吴克歧《忏玉楼丛书提要》云:“考《红楼梦》最流行时代,初为程小泉本,继则王雪香本,逮此本出而诸本几废矣。”<sup>②</sup>《儒林外史》的著名版本如卧闲草堂本、黄小田评本、齐省堂评本、天目山樵评本等也皆附有评点者多寡不等的“副文本”。

其他评点者也以琳琅满目的“副文本”丰富了小说文本形态的内涵。如万历间署为“西蜀升庵杨慎批评”的《镌杨升庵批点隋唐两朝史传》卷首附有“镌杨升庵批点隋唐两朝史传附录”,主要内容为《君臣姓氏》,包括“隋纪”、“唐纪”、“附唐高祖皇族子姓二十二人、后妃一十八人”、“皇族诸郡王”以及从高祖至僖宗的历朝“文武诸大臣姓氏”、“僭伪隋纪”、“附录各部将官姓氏”;康熙间钓璜轩本《女仙外史》卷首附有评点者陈奕禧“序言”、刘廷玑“品题二十则”、杨颢“评论七则”、叶尊“跋语”等;乾隆原刊本《北史演义》卷首有评点者许宝善所作序、凡例,甚至他还为某些插图题写了赞语,像“世子高澄”一图的赞语即出自他手;道光十八年本衙藏板本《林兰香》卷首有评点者寄旅散人的《林兰香人物》《林兰香丛语》;光绪间《燕南尚生新评水浒传》卷首有燕南尚生《新评水浒传叙》《新评水浒传凡例》《新或问》《新评水浒传命名释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可以说,明清时期的评点本都附以多少不一、名目各异的“副文本”,它们都成为小说文本的重要表现形态。

有些评点者因与作者的特殊关系而共同塑成了小说文本形态。其中,《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出于脂砚斋与曹雪芹的密切合作是自不待言的。其他如崇祯间《崢霄馆评定通俗演义型世言》每回前名目不一的“序”、“叙”、“引”、“小引”、“题词”及以“雨侯曰”形式出现的回末总评,皆出自小说作者陆人龙之兄陆云龙之手。而且,从第一回总评所谓“宜合纪之以为世型”及第三回卷首“小引”所谓“树型今世”看,“型世言”之名也应出于陆云龙之手。再如康熙间本衙藏板原刊本《生花梦》署“娥川主人编次”、“青门逸史点评”,二人为知交好友,青门逸史自称与“予友娥川主人”“居同里”,小说创作完成后,娥川主人曾“属予名编”,于是他便“颜之曰《生花梦》”<sup>③</sup>,由此可知“生花梦”之名乃由评者青门逸史拟定。有时评者与作者有固定的合作关系,如顺康间李渔《无声戏》《十二楼》《无声戏合集》均署“湖上笠翁编次,睡乡祭酒批评”,睡乡祭酒乃作者友人杜濬;乾隆间杜纲《娱目醒心编》《北史演义》《南史演义》均由作者至交许宝善作序、评点。有时那些与作者关系密切的评者还将文人酬答习气带入小说评点领域,从而形成多人评点一部小说的现象,如钓璜轩本《女仙外史》的评点者竟达六十七人,其中不乏像江西廉使刘廷玑、广州府太守叶南田、江西南安郡守陈奕禧、吏部尚书宋荤以及杨颢、徐秉义、洪昇、王士禛、韩象起、陈履端、杨宾之类官场人物或著名文人。嘉庆十四年镌本《岭南逸史》由“醉园”、“张竹园”、“启轩”、“张念斋”、“谢菊园”、“张锦溪”、“野鹤道人”、“葛劲亭”、“刘松亭”等共同评点;嘉庆二十三年苏州原刻本《镜花缘》有许乔林序、洪棣元序、孙吉昌等六家题辞,还包括许祥龄、萧荣修、孙吉昌、喧之、菊如、合成、冶成等人的回末总评,这些评点者一般多与作者相交,他们以自己的“副文本”进一步丰富了小说文本形态。

值得一提的是,某些小说家是以自作自评的方式塑成小说文本形态。如《于少保萃忠传》中署为“孙明卿赞云”的回评有十二处,而孙明卿即小说作者之一孙高亮。陈忱《水浒后传》题“古宋遗民著”、“雁荡山樵评”,而“古宋遗民”与“雁荡山樵”皆为陈忱别号,因此小说中“原序”及“序”、《水

①张新之:《妙复轩评石头记自记》,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第699页。

②吴克歧:《忏玉楼丛书提要》,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第206页。

③青门逸史:《生花梦序》,娥川主人《生花梦》,《古本小说集成》第3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4页。



浒后传论略》都出于陈忱之手。魏秀仁自作自评《花月痕》，光绪间福州吴玉田刊本卷首附有他作的《前序》《后序》《棲梧花史小传》及《题词》。《姑妄言》评点者林钝翁实为作者曹去晶本人，该书卷首《总评》云：“予与曹子去晶，虽曰异姓，实为一体。自襁褓至壮迄老，如影之随形，无呼吸之间相离。生则同生，死则同死之友也。”显然，林钝翁与曹去晶实为一人。而且，卷首作者《自评》又称“既欲看是书，请先阅此评”，可见作者已将自己的“副文本”视为重要的文本形态。道光二十五年慎修堂藏板本《瑶华传》卷首有作者丁秉仁自序，他自称与同窗好友阆仙对小说“互相考订，复加评语”。其他如袁于令《剑啸阁批评秘本出像隋史遗文》、于华玉《岳武穆尽忠报国传》、陆云龙《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等，亦皆为小说家自作自评之作。及至晚清民初，小说家自作自评现象也很常见，如徐枕亚将《玉梨魂》改为日记体小说《雪鸿泪史》，并“附注评语，以清眉目”<sup>①</sup>。

当然，评点者的评点意图不同，其评点本中“副文本”的表现形态也各有差异。如以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等为代表的文法派评点者着眼于评本的传播，因此具有导读功能的“读法”、回评、眉批、夹批等“副文本”一应俱全。而有的评点者的小说评点完全出于自娱自赏，并没有特定的传播目的，因此其评点形态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其中最典型的是脂砚斋对《红楼梦》的评点，脂批中并无具有导读功能及提纲挈领性质的“读法”，各回也没有篇幅长大的总评，卷首更没有其他小说评点本中常见的序跋、题咏之类“副文本”。

（责任编辑：邓晓东）

## Influence of Commentaries and Annotations on the Form of the Novel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HEN Cai-xun

**Abstract:**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same story, some commentaries and annotations offered by the critics on the margins of previous texts were often converted into an organic part of the body of the text in the following versions. Therefore, the text of the novel usually underwent some changes. The literary critic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hose criticism was characteriz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commentary and re-wording, actually assumed the role of “second author”. “The second authors”, collaborating with the original authors, determined the form and evolution of the novels through addition, deletion, re-wording and adaptation. However, the annotations and comments they made on the margins of the different copies of the text all depend parasitically on the body of the text, lacking independent textual value. Other paratexts like appendices, though being important components influencing the forms of the novel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lso rely on the body text to spread.

**Key words:** critic; text form; generation and evolution

<sup>①</sup>徐枕亚：《〈雪鸿泪史〉例言》，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54页。